

共鑒「五四」

——與李澤厚、李歐梵等共論「五四」

劉再復 著



共鑒「五四」

——與李澤厚、李歐梵等共論五四

劉再復 著



責任編輯 舒 非

美術設計 鍾文君

書 名 共鑒「五四」——與李澤厚、李歐梵等共論「五四」

著 者 劉再復

出 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1304室
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Rm.1304, 1065 King's Road, Quarry Bay, Hong Kong

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

印 刷 深圳市恆特美印刷有限公司

深圳市寶安區龍華民治橫嶺村恆特美印刷工業園

版 次 2009年6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規 格 特16開（150mm×228mm）176 面

國際書號 ISBN 978 . 962 . 04 . 2100 . 6

© 2009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“五四”五說（代序）

李澤厚 劉再復

一 “五四”了不起

劉再復（下稱劉）：今年是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九十周年，香港三聯約我一本書，我就把這兩年發表的有關於“五四”的訪談、對話、文章匯為集子，也藉此更加明快地表述一下自己對“五四”啟蒙運動的思想。此集您如果能作序言就好了，可惜您已封筆，只好作罷。不過，今天我還是想再聽聽您對於“五四”有沒有新的想法。在《中國現代思想史論》和《告別革命》中，您已作過充分論述。十幾年、二十幾年過去了，語境變了，不知道您有無修正或補正。

李澤厚（下稱李）：我讀了你最近發表在《書屋》的文章和訪談，寫得很好。我對“五四”的看法沒有改變。在詆毀“五四”、盛行尊孔成為時尚的今天，我更頑固地堅持原有的看法。“五四”了不起。胡適、陳獨秀、魯迅之大功不可沒。

劉：“五四”了不起，您的態度一直很鮮明。我雖然談論“五四”的缺陷，但也充分肯定其歷史功勳。白話試驗，文字奉還，個性呼喚，發現傳統資源不足以應付現代化的挑戰和理性邏輯文化的闕如等，都是功不可沒。

李：談論中國近現代史，特別是近現代思想史，前不可能繞過康、梁、嚴，後不可能繞過陳、胡、魯。他們是重要的文化歷史存在。可

以不講陳寅恪、錢鍾書，但不可不講魯迅、胡適。

劉：陳、魯、胡作為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的旗手，其思想代表了一個時代並輻射了幾代人。康梁那個時代講的新國民，着眼點還是“群”，陳獨秀、魯迅、胡適卻破除“國家偶像”，着眼點是“己”，突出的是個人。所以我說康梁時代是“民族—國家”意識的覺醒，“五四”則是“人一個體”意識的覺醒。之後還有“階級”意識的覺醒。三者形成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流。

李：“五四”時期各種思潮聚匯，當時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就很盛行。“五四”突出個人，張揚個性。可惜後來“個性”又被消滅了。“五四”的了不起，在於它的主題鮮明，擊中要害，中國缺的正是個性和個體獨立的精神與品格。

劉：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解決。在中國，支撐個人獨立不移的品格真不容易。我喜歡用“個體靈魂主權”一詞來表述。覺得康梁時代關注的重心是國家主權和相應的社會制度合理性問題，而“五四”關注的重心則是個人靈魂的主權。反對奴性，反對國家偶像，反對族群偶像孔夫子，都是在呼喚靈魂的主權。

二 反孔也了不起

李：“五四”批判孔家店不同於文革的批孔，兩者實質內容恰好相反。漢代“獨尊儒術”以來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都尊孔。其中的確有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方面。康有為的變法改制還必須打着孔子的旗號，可見走向現代化，行步維艱。直到五四才直接挑戰孔子，結束兩千年一貫的尊孔歷史。文革時的批孔恰好是維護專制統治。第一幕是

了不起的悲劇，第二幕是可笑的鬧劇。

劉：第一幕中孔子雖然擔荷中國文化負面的全部歷史罪惡，但批判的畢竟不是孔子儒家的原典，而是被宋儒明儒和後人改造過的變形的孔夫子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“五四”的批孔，反而去敝存真，揚棄了真孔子的覆蓋層，使孔子的原典學說具備恢復本來面目的可能。您寫《論語今讀》，不就得益於“五四”的批判，直面沒有被遮蔽、被改造的孔子嗎？文革第二幕，我們親自經歷過，那確實是相反，狠批的是孔子原典和孔子本人，把孔子說成是“巧偽人”，把《論語》一段一段宰割，而把“五四”批掉的“忠”字舉得高入雲天，愈批愈走遠，不僅離孔子原典愈遠，也離五四的現代精神尤其是科學民主精神愈遠。去年我應《金融時報》張力奮兄的邀請，寫了《誰是最可憐的人》，認為孔子最可憐，因為他被隨便揉捏，隨便解釋。其次孔子的儒家原典具有很高的倫理價值、教育價值，甚至有很高的哲學價值。正如您在《論語今讀》中所評價的那樣，孔子把人的地位提得很高，確實是具有原創性的思想體系。但是孔子學說後來被改造成為帝王服務的典章制度和意識形態以及“三從四德”等一套行為模式，就變得面目可憎了。“五四”攻擊的實際上是變形變質了的孔夫子。您在《波齋新說》裡首次把儒分為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，對我很有啟發，《紅樓夢》作為異端之書，它反叛的是儒家的道統即典章制度和意識形態，但是對您所說的“情本體”這種深層內涵，卻極為尊重，所以賈寶玉在意識形態層面上是個逆子，但在倫理情感層面上卻仍然是個“孝子”。

李：你的《誰是最可憐的人》，寫得很生動。對孔子的尊敬，不是讓

孔子去媚俗。記得李大釗等當年也說過，他們批判的孔子，是宋明道學家塑造過的孔子。其實只有批判掉這個孔子，才能恢復原典儒家的孔子，只有批判“存天理滅人欲”、尊重心性修養的孔子，才能恢復重視情感、重視物質生命、重視人民現實生活的孔子。“五四”反對的是在孔子名義下的君臣秩序、父子秩序、夫妻秩序以及所延長的婦女“節烈”觀，（連僻遠的山區如張家界也可以看到貞節牌坊），如此等等，這一套確實非常不符合於現代社會的生存發展。是“五四”發出第一聲強烈的抗議吶喊。

劉：魯迅所憎惡的“二十四孝圖”，什麼郭巨埋兒，曹娥投江等等，每樣行為語言，都是在孔子孝道名義下吃人、吃孩子、吃婦女。批判這種變態的孔夫子，也屬天經地義，九十年過去，中國人再也不必去充當悲慘可憐的孝子節婦了，這要感謝“五四”的先人先賢。可是，這幾年，孔夫子恢復名義之後，又有一些知識人要把老師當父親，行拜祭大禮，不知又要把孔子揉捏成什麼樣子？

三 最缺的還是“德賽”兩先生

李：十多年前我寫《論語今讀》，返回孔子。現在尊孔成了時髦，我就不再談了。因為講孔子成了掩蓋更重要更必須的東西的手段。中國現在最需要的還是“五四”推出來的兩先生：“德”先生與“賽”先生，我高度評價孔子，但反對以尊孔的潮流來掩蓋現代文明所要的科學與民主。對於傳統，林毓生講“創造性轉化”，我講“轉化性創造”。孔子是我們的重要資源，但不能代替我們的現代創造。

劉：“五四”的大思路是用西方的理念來批判中國傳統，以實現傳統

的西化，但其致命的弱點是缺少自身的理論創造。您的命題實際上是要開掘傳統資源，打通中西文化血脈，實現自己的建設性創造。重心是建構，不是解構。後現代主義思潮以解構西方形而上體系為目標，否定西方啟蒙理性，這種主義形成了時尚。我覺得，科學與民主正是西方啟蒙運動的兩大基本成果，“五四”把它“拿來”，是拿對了。二十世紀的西方，科學技術的發展取得巨大成就，但科學理性卻朝着“工具理性”傾斜，忽視了“價值理性”，即忽視了“真善美”這些基本價值。學校教育也以培養“生存技能”（屬工具理性範疇）為第一目的，未能以提高“生命質量”為第一目的。中國也正在向西方看齊。在這種歷史場合中，孔子的教育思想（把“學為人”作為第一目的）和倫理思想倒是值得我們特別重視，但不能照搬，特別不能讓變形的孔夫子捲土重來。確實如您所講，要完成轉化性創造，要吸收西方理性文化的巨大成果，建設具有中國色彩的科學民主系統，如您所說的要走自己的路。

李：走自己的路，我一直強調這一點。八年前在香港城市大學的校長沙龍裡，我講的內容就是中國要走自己的路。其實八十年代我就講過。各國國家的傳統、資源、內外部條件、文化心理差別很大，怎麼可能走一樣的路？

四 告別“新啟蒙”

劉：八八年王元化先生和劉曉波又提“新啟蒙”的口號，第一次在北京聚會，邀我參加，我謝絕了。這原因是儘管我充分肯定“五四”啟蒙運動的功勳，但覺得時代不同了。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民主啟蒙，而

在於如何把民主理念落實到制度上。例如民主形式如何確立就是個大問題，不用說國家，就是一個學術會議，民主形式（制度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李：時代不同，課題也不同。當時我是不欣賞、不參與他們的“新啟蒙”的。因為我認為八十年代後期直到今天，主要的問題已不是啟蒙，而是如何改良和改革制度。建立新的制度，比空喊啟蒙更迫切、更重要，也更艱難，更需要研究討論。即使思想文化層面說，也不能停留在啟蒙水平。八十年代我用“提倡啟蒙、超越啟蒙”八個字來概括魯迅，現在看來，似乎仍然沒錯，只是我說得比較簡單粗略。魯迅比其他啟蒙者更深刻的地方是超越了啟蒙，思考人的存在意義。不只是着眼於喚醒民眾，而是展示個人孤獨存在的內心。你是搞文學的，對這一點的了解和體會一定更深切。

劉：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，抒寫孤獨的內心，叩問存在的意義，在現代社會潮流面前充滿不安感和動盪感，魯迅可以說是唯一的例子。他的《野草》，其深刻性就在這裡。中國現代散文能抵達這樣的精神深淵，真是奇跡。魯迅完成了超越之後，晚年受國際左翼思潮的影響，又熱烈擁抱社會是非，返回救亡。一是超越啟蒙；二是返回救亡，這是魯迅精神之旅的兩大現象。真正的思想者個體是很豐富的，其生命的曲線與多彩也很正常。但我們現在既不能返回啟蒙，也無需返回救亡。您的“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”已屬於過去。不過，回顧九十年，覺得還是魯迅最深邃，最偉大。前些時，魯迅博物館研究員姜異新博士訪問我，提出幾個很有意思的問題，其中有一個對“五四”新文學諸主將的評價問題，我也說，魯迅確實無人可比。胡適開風氣

之先，功勞很大，但思想不如魯迅深刻，新文體的創造也不如魯迅傑出。不過他是個學問家，不能要求他像魯迅那樣進入深邃的內心。周作人極為勤奮，“五四”時是人文主義旗幟的旗手，但其創作，有知識性卻無思想深度與思想力度，比魯迅差遠了。後來他在北方“談龍說虎”，完全沒有現代感。

五 “五四”新文化諸子評說

李：魯迅一直是我最崇敬的人物。我是頑固的挺魯派，從初中到今日，始終如此。我最近特別高興讀到一些極不相同的人如吳冠中、周汝昌、徐梵澄、顧隨等都從不同方面認同魯迅而不認同周作人、胡適。這些人都是認真的知識分子、藝術家和學問家，並非左翼作家和激進派，卻都崇尚魯迅，魯迅不僅思想好，人品好，文章也最好。一些人極力拔高周作人、張愛玲等人，用以壓倒或貶低魯迅，用文學技巧來壓倒思想內容。學界也流行以“知識”、“學問”來壓倒和貶低思想。其實，嚴復當年就說過，中國學人崇博雅，“誇多識”；而西方學人重見解，“尚新知”。愛因斯坦的新知、見解，難道不勝過一座圖書館嗎？

劉：嚴復的話真是擊中要害。十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，就說現在學界是學術的姿態壓倒學術的真誠，即壓倒追求真理的熱情，也用知識掩蓋思想的貧血症。許多人讀了《告別革命》，發現您對周作人、郭沫若、老舍的尖銳批評，感到很震驚。周作人身上太多中國舊文人的習氣，最後越過中國族群的道德底線，當了漢奸，真是個大悲劇。您對胡適評價也一直不高。

李：胡適和周作人不同。胡的作風很好，有成就而仍然寬容、謙和，其自由主義思想、風格，在中國至今仍有重要價值。但他的思想確實不如魯迅深刻，例如說中國的問題是“五鬼鬧中華”，未免太淺了。周作人散文中是有些小知識，但不是大知識。錢鍾書才可以算大知識、大學問。他的學問甚至可以說“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”。但也無須來者了。可惜，他在可開掘思想的關鍵之處，卻未能深“錐”下去。這可舉的例子很多，就拿《管錐編增訂》（1982年9月第一版）的第一篇來說，你讀讀這下半段：

《詩·文王》以“無聲無臭”形容“上天之載”之旨，亦《老子》反復所言“玄德”（第一〇、五一、六五章；參觀一五章：“古之善為道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”），王弼註謂“不知其主，出乎幽冥”者也（參觀第一八章註：“行術用明，……趣觀形見，物知避之”；三六章註：“器不可觀，而物各得其所，則國之利器也”；四九章註：“害之大也，莫大於用其明矣。……無所察焉，百姓何避？”）。尊嚴上帝，屏息潛蹤，靜如鼠子，動若偷兒，用意蓋同申、韓、鬼谷輩侈陳“聖人之道陰，在隱與匿”、“聖人貴夜行”耳（參觀256—8頁）。《韓非子·八經》曰：“故明主之行制也天，其用人也鬼”，舊註謂如天之“不可測”，如鬼之“陰密”。《老子》第四章稱“道”曰：“建德若偷”（參觀嚴遵《道德指歸論·上士聞道篇》：“建德若偷，無所不成”，王弼註：“偷、匹也”，義不可通，校改紛如，都未厭心，竊以為“匹”乃“匿”之訛。“偷”如《莊子·漁父》“偷拔其所欲謂之險”之“偷”，宜穎註：“潛引人

心中之欲。”《出曜經》卷一五《利養品》下稱“息心”得“智慧解脫”曰：“如鼠藏穴，潛隱習教。”夫證道得解，而曰“若偷”“如鼠”，殆類“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”（第四二章，又三九章）歟。

多精彩。這段話把中國的“聖王”秘訣，他們最重要的手段和技巧是什麼，全揭開了，講到了關鍵。如果繼續開掘下去，以錢鍾書的學識本領，極易將帝王術各個方面的統治方略全盤托出而發人深省，可惜卻戛然而止，轉述其他。

劉：真是如此。這一則，上半段談上帝，我們把它省略了。僅此下半段讀起來就夠讓人驚心動魄的。中國的聖人之道在“隱與匿”，帝王之術，如鼠藏穴，如鬼潛蹤，但都打着深不可測的天意。中國的智慧在天子與聖人處如此變質，真是匪夷所思。錢先生的著作是個大礦藏，他用全部生命建構礦山，把開掘的使命留給後人。在可開掘思想的關鍵之處深錐下去，這倒是您這個思想家的特長。○二年我讀您的《歷史本體論》，一打開書頁，第一節就講“度”的本體性。什麼是度？度就是“掌握分寸，恰到好處”。您說度的本體（由人類感性實踐活動所產生）之所以大於理性，正在於它有某種不可規定性、不可預計性。而歷史本體就建立在這個動態的永不停頓地前往着的“度”的實現中，它是“以美啟真”的“神秘”的人類學的生命力量，也是“天人合一”新解釋的奧秘所在。您在其他文章也多次講“度”，把度與中國的中道哲學、和諧哲學聯繫起來思索。每次想起您這個“度”字，就想到錢先生的“幾”字。他在《管錐編》第一冊《周易

正義》第十九則（擊辭（三）：知幾）中就有“幾”意的上百則例證與匯註，其知識密度真是驚人。所謂幾就是“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。”也就是臨界點、分寸感，也就是您講的預計和度。錢先生的功夫是把古今中外（包括詩詞）有關“幾”字的應用、疏解都“一網打盡”，可是他卻未能抓住“幾”字作出您的“歷史本體論”的大文章，今天我很有收穫，可把錢先生和您聯繫起來思索了。

李：可談的真是太多。所以我說周作人的知識性散文，連學問也談不上，只是“雅趣”而已。

劉：我贊成您對錢鍾書先生的評價。他不是思想家，但其學問確實是“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”。您說的對，前人博識者雖有，如紀曉嵐，但不懂外文，書中不可能融會中西學識。而後人外語是強了，但要像錢先生擁有如此深厚的古典底蘊，恐怕是不可能了。有人批評《管錐編》“散錢失串”，不無道理，因為它無理論中軸，缺少體系構架，但這也帶來一個長處，就是不把自己的豐富精神寶藏封閉在若干大概念的符號系統中，即不會因為體系的邏輯需要而刪除寶庫的多彩多姿。與錢先生相比，周作人的知識格局確實顯得小。但周作人畢竟是文學家，其文學的閒情逸趣，也給社會上的一部分讀者得到審美愉悅。他的自然淡雅情調影響了一些作家，如俞平伯、廢名等，其品書抄摘功夫也影響了後來的散文寫作。您的審美尺度，似更重視文學須給人以力量。

李：也不僅如此。審美，鑒賞作家作品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是多種因素的綜合判斷。我在《美學四講》裡講文學有情感、理解、想像、感知諸因素，每一種要素又可再分解。但文學之厲害，倒確實是

思想化作情感力量去打動人，魯迅就有這種力量。

劉：剛才您講幾個與魯迅風格全然不同的學者藝術家，對魯迅均心悅誠服，其中除了顧隨我感到陌生之外，其他人確實衷心敬愛魯迅。吳冠中先生這樣一個很有成就的畫家，竟然說出“一百個齊白石也不如一個魯迅”的話。您對齊白石也挺喜歡，曾讚揚他是“地地道道根底深厚的中國意味、中國風韻”，他是民族的，又不保守。可是您也認同吳冠中的絕對性評價。徐梵澄就在您們哲學所，我在社科院二十七年，有幾件遺憾事，其中一件是未曾拜訪過徐先生。因為在國內時我對佛教、禪宗和印度文化的興趣沒有現在這麼濃厚。他在印度深造、鑽研四十多年，翻譯了《奧義書》和《神聖人生論》，對印度文化特別是印度宗教真有研究。回國後他唯一崇敬的就是個魯迅。儘管這與他在青年時代見過魯迅並受魯迅之託翻譯尼采的緣份有關。《徐梵澄文集》的編者曾對他的人生作了這樣的總結（也許就是他的自白）：梵澄由翻譯尼采而進之於介紹室利阿羅頻多，又從研究印度古代文明之寶典回歸於闡揚中國傳統文化之菁華，此一精神企向圓成之軌跡，端的是沿着魯迅“立人”、“改造國民性”的文化理想邁進的。後來他又寫了《星花舊影》和《略說“雜文”和“野草”》等文紀念魯迅，文中說：“先生（指魯迅）對國家民族以及世界人類貢獻之偉大，誠也不可磨滅，不朽。”（《徐梵澄文集》第四卷第397頁，上海三聯分店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）這是一個老實人說的老實話，魯迅真的是不滅不朽。

李：我知道他從印度回來後在哲學所，可是我也一直未見過他。他埋頭梵文經典，可是對魯迅卻如此景仰。周汝昌的《紅樓夢新證》是我

喜歡讀的書，我比較相信他說的。他對魯迅的評價也很高。儘管他在年青時受到胡適的幫助，感激胡適，但他說魯迅對《紅樓夢》的見解比胡適深刻。

劉：“五四”之後的新文學作家，也沒人能趕上魯迅。香港嶺南大學召開張愛玲學術討論會，我發表了不同的聲音，認為張是個“夭折的天才”，其成就無法與魯迅相比。當時很多人不高興，但您支持我。

李：把張愛玲說成比魯迅更高，實在過份。藝術鑒賞涉及到審美對象諸多因素的把握和綜合性的“判斷”，不能只看文字技巧。張愛玲學《紅樓夢》的細緻功夫的確不錯，但其境界、精神、美學含量等等，與魯迅相去太遠了。要論文字，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怕不如屠格涅夫，但他的思想力度所推動的整體文學藝術水平卻遠非屠格涅夫可比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正在於他那種叩問靈魂、震撼人心的巨大思想情感力量。

劉：我們以往的文學批評強調政治標準，弄得不知何為文學，現在也不可過份強調文字技巧而忽略文學的精神內涵。一是精神內涵，二是審美形式，兩者缺一不可。法國古典主義玩賞“三一律”，把文學技巧推向極致，但最終創造不了第一流的好文學。

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八日

於美國

目 錄

“五四”五說（代序） 李澤厚 劉再復 ----- I

- 一 “五四”了不起 ----- I
- 二 反孔也了不起 ----- II
- 三 最缺的還是“德賽”兩先生 ----- IV
- 四 告別“新啟蒙” ----- V
- 五 “五四”新文化諸子評說 ----- VII

第一篇 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批評提綱 ----- 001

- 一 重心明確但理論準備不足 ----- 003
- 二 “批孔”的合理性與浪漫性 ----- 006
- 三 “德賽”兩先生的體用分離 ----- 009
- 四 文學革命的概念錯位 ----- 011
- 五 現代人文經典創造意識的闕如 ----- 014
- 六 主攻對象置換的假設 ----- 019

附論一 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（提綱） ----- 021

- 一 問題的提出：“五四”運動的概念錯位 ----- 021
- 二 貴族精神的內核 ----- 022
- 三 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 ----- 026
- 四 貴族精神失落後的若干精神現象 ----- 028

附論二 誰是最可憐的人 ----- 031

附論三 蔡元培的內心律令

——在香港北京大學校友會上的講話 ----- 037

第二篇 “五四”啟蒙課題答問紀要

——答北京魯迅博物館姜異新博士問 ----- 043

- 一 關於啟蒙的反思與懷疑 ----- 045
- 二 現代啟蒙有無獨特的話語譜系 ----- 049
- 三 “五四”若干主將的不同思路 ----- 053
- 四 清華諸子也屬新文化範疇 ----- 056
- 五 《紅樓夢》是“五四”的先聲 ----- 060
- 六 關於魯迅的新認識 ----- 062
- 七 海外語境的思索與研究 ----- 067

第三篇 病理學啟蒙的反思

——與李歐梵的對話 ----- 071

- 一 病理學啟蒙與生理學啟蒙 ----- 073
- 二 行動生活與沉思生活 ----- 077
- 三 獨立存在與象牙之塔 ----- 080
- 四 抽象能力與形而上品格 ----- 081
- 五 “新啟蒙”命題已過時 ----- 084

第四篇 “五四”核心理念及其歷史語境

——近現代三大意識的覺醒 ----- 087

- 一 “民族—國家”意識的覺醒 ----- 090